

# 自然即背景,诗歌即目的

——读李少君《我是有背景的人》

■杨庆祥

拿到李少君的新诗集《我是有背景的人》,不禁莞尔一笑。这个书名乍一看触目惊心——李少君曾经在《夜深时》写到“花落满地,让人触目惊心。但熟悉李少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背景”不是中国语境中政治经济学上的“权力”,而是一种美学上的指涉。李少君说,“自然就是我的背景”,这句话说得很好,有格言的味道。大概坐在湖边的梭罗一定会同意这个观点,但梭罗没有找到汉语这么精妙的表达,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倒是可以追溯为李少君遥远的祖灵。

日本的文艺理论家柄谷行人提出过著名的“风景论”观点。他说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就在于日本的现代作家们从汉文学的静态风景中发现了一种否定性的风景,然后一种以客观和真实为要点的现实主义诞生了。“汉文学的风景”是什么?柄谷行人有点语焉不详,但他提到了中国美学的典型代表山水画,将山水画指认为汉文学的风景。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山水画不能作为孤立的摹本来进行理解,因为纸上的山水对位的不仅有自然的山水,还有人心的山水。

这正是我要阐明的观点。自然,这一看起来简单的词汇有一种综合性的含义,它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自然代表了某种最高的意志和秩序,带有宗教和哲学形而上学的意义。在东方哲学里,指的是“天”、“道”等,在西方哲学里,类似于“物自体”;第二,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的自然界,它指的是作为一种客体存在的,可以探究、认知和书写的存在;第三,基于以上两点,同时又加入个人认知的视野,于是有一种“自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不是功利性的,而是非功利的、审美的。

意识到这种自然的层次和观念,我们大概就能读懂李少君三言两语中的微言大义。请看一首《南渡江》:

每天,我都会驱车去看一眼南渡江  
有时,仅仅是为了知道晨曦中的南渡江  
与夕阳西下的南渡江有无变化  
或者,烟雨朦胧中的南渡江  
与月光下的南渡江有什么不同



《我是有背景的人》  
李少君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看了又怎么样?  
看了,心情就会好一点点

整首诗只有七行,核心意象只有一个“南渡江”,观看的视角在“我”和“南渡江”之间。这“南渡江”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观,但因为“我”的观看,又变成了一种带有主体人格的动态而非静态的风景。最后在一种不无叹息的自嘲中,流露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人生姿态。再看另外一首诗

《渡》:  
黄昏,渡口,一位渡船客站在台阶上  
眼神迷惘,看着眼前的野花和流水  
他似乎在等候,又仿佛是迷路到了这里  
在迟疑的刹那,暮色笼罩下来  
远处,青林含烟,青峰吐云  
暮色中的他油然而生听天命之感  
确实,他无意中来到此地,不知道怎样渡船,渡谁的船  
甚至不知道如何渡过黄昏,犹豫之中黑夜即将降临

这首诗关键的节点其实并非在于“渡”这一具体的事件,而是由这一事件所弥散出来的一种缠绕的情绪和情思。非常有意思的是,当面临“渡”的选择时——这会让我们想到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李少君没有去作一种西方哲学式的思辨,而是信马由缰,看到了“自然”和“天命”,最后不是在“抉择”而是在“犹豫”中将诗歌推向了一种“未尽”的尽头。

这是李少君的诗歌美学,其背后,有着其独具一格的诗歌创制能力和思考方式。他将诗歌视为是心、情、意的统一体。“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凝聚情感,用心写作……诗歌是一种心学,诗歌也是一种情学……情之深入、持续与执著,产生意。”

在荒芜的大地上  
我只能以山水为诗  
在遥远的岛屿上  
我会唱浪涛之歌

白云无根,流水无尽,情怀无边  
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浪,一飞而过

……海上啊,到处是我的身影和形象

最终,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辽阔的心

这首诗名为《自道》,可以看作是李少君诗学的形象化表达,他引用布罗茨基的话说:诗是我们人类的目的。其实在海天之间,本来就没有目的,诗歌也不过是“无人认领”之物,只不过这一次,李少君偶然拾起了它。

# 乾隆眼里的“西洋镜”

——读罗山《职贡图》

■唐骋华

中国历史上称得上雄主的君王不少,但是像乾隆那般自恋,几乎要将“雄主”二字刻到脑门上的,着实不多。终其一生,乾隆写了四万余首诗,其中有相当比例属于自我歌颂,吹捧自个儿的“十全武功”。他命人编制《西域图志》、编纂《四库全书》,目的虽然有好几重,但展示大清在其治理下寰宇一统、文教兴盛,是重要动机。《皇清职贡图》的诞生同样如此。

所谓《职贡图》,就是为外国进贡使团画像,并辅以介绍性文字。说白了,是将老外画下来,再加几句图片说明,好让天下臣工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有哪些风俗,类似于上海人说的“看西洋镜”。

乾隆对于“西洋镜”的爱好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不仅搜罗历朝历代的《职贡图》,还加以品评。例如,乾隆讥讽《梁元帝职贡图》:“诏令所行,不过千里,民户着籍,不盈三万,岂尚有番夷朝贡之事!”梁朝那点巴掌大的地方,番邦会瞧得上?什么朝贡,你就吹吧!言下之意,我大清王朝才是真正的万国来朝啊。

于是公元1751年,乾隆下令各地督抚为当地少数民族,及有来往的国家之民族画像,然后汇总给军机处,制成《皇清职贡图》。从中可一窥乾隆的野望:历来《职贡图》只记录外国使臣,乾隆却将“世界各民族”悉数纳入,大有“普天之下皆受皇恩”的潜台词。

所幸乾隆的态度还算端正。他要求



《职贡图》  
罗山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臣下细致考察,画像要符合原貌,描述要真实可信,千万别弄成神神叨叨的《山海经》。因此,《皇清职贡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材料,让我们得以了解清朝中期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尤其是“域外卷”,读来既长知识,又有趣味。罗山新作《职贡图——古代中国人眼中的域外世界》即围绕这部分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

域外卷收录朝鲜、安南(今越南)、日本、琉球、英吉利、法兰西、匈牙利等国情形,横跨欧亚大陆,内容丰富。这些国家,

我们不妨以“儒家文明圈”为界,分成内圈和外圈。从罗山的研究来看,圈内圈外,《皇清职贡图》传递的信息和态度是有极大差别的。

构成“内圈”的朝鲜、日本、安南等国,与中国有上千年交往,且深受儒家文明影响。因为熟悉,编撰者对其历史、风俗的记录比较准确详细。也正因为熟悉,难免带着刻板印象。例如,编撰者一方面对它们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情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称朝鲜人为“高丽棒子”,说安南人和日本人“夷性狡诈”,等等。这种姿态,体现了“天朝上国”俯视“蕞尔小国”时的优越感。

对外圈的介绍就简略得多,而且充满错误。《皇清职贡图》是这样描述英国的:“(英)吉利,亦荷兰属国夷人。”英国成了荷兰属国,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值得追问的是,这个国际玩笑是如何产生的?

罗山分析,早期到东亚的欧洲人,多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他们是第一批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洋人,也是向中国传递欧洲风土人情的“二道贩子”。当乾隆下令绘制《皇清职贡图》,当地官员就询问这些二道贩子有关英国、法国的情况。十七、十八世纪,荷兰跟英国争霸权,荷兰人对英国肯定没有好感。所以不难推断,“英吉利是荷兰属国”的说法出自荷兰人之口。他们趁机贬低对手,而负责收集

信息的清朝官员由于缺少其他渠道,就采信了。

描述法国的文字同样令人发噱。编撰者竟然说法兰西国“初奉佛教,后奉天主教”,还占据澳门,错得匪夷所思。究其原因,诚如罗山指出的,收集者信源有限,只依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而后者出于各种动机,经常扭曲信息,误导清朝官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皇清职贡图》反映的,更像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想让清朝人看到的外部世界。

那为什么清朝官员无法多方查证呢?要知道,至18世纪,大航海时代已开启一百多年,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足迹遍布全球,英国人、法国人正后来居上。欧洲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呈爆炸性增长。

可惜的是,明清两代对海洋没多大兴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基本停止了对外探索。中国人的世界观陷入停滞。到乾隆下令绘制《皇清职贡图》的175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头正猛,法国也加紧在印度扩张,清朝官员却仍然只能通过葡萄牙、荷兰等国商人获取零星信息。他们并不觉得应当实地考察一番。

反正皇帝满意了。1761年,为庆祝皇太后70寿诞,乾隆命令绘制《万国来朝图》。罗山注意到,图中的外国使臣拷贝自《皇清职贡图》,连配色都没变。看来,乾隆只沉浸于“万国来朝”的繁荣,而无意睁眼看看“皇清”以外的世界。